

曹蔚
彭阳
著

竹庵談藝

易经释奥

附占卜答问

钟嵘诗品译注

归有光评传

中国古代哲理诗存目

竹庵谈艺

黔新登字 90(04)号

封面设计:杨喜桥

责任编辑:孔燕君

技术设计:彦 君

竹庵谈艺

谭 蔚 彭润阳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 300 千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412—0371—8/I·134 定价:9.80 元

易经释奥

《易经释奥》目次

关于《易》经研究的反思

——写在《易经释奥》的前面

1

键（乾）卦第一	23	妇（否）卦第二	28	豫（遁）卦第三	31
礼（履）卦第四	34	讼（讼）卦第五	36	同人（同人）卦第六	39
无孟（无妄）卦第七	41	狗（姤）卦第八	43	根（艮）卦第九	45
泰蓄（大畜）卦第十	47	剥（剥）卦第十一	49	损（损）卦第十二	51
蒙（蒙）卦第十三	54	贲（贲）卦第十四	56	颐（颐）卦第十五	58
箇（蛊）卦第十六	60	习贲（坎）卦第十七	62	襦（需）卦第十八	64
比（比）卦第十九	66	蹇（蹇）卦第二十	68	节（节）卦第二十一	69
终济（既济）卦第二十二	71	屯（屯）卦第二十三	73	井（井）卦第二十四	75
辰（震）卦第二十五	77	泰壮（大壮）卦第二十六	79	豫（豫）卦第二十七	81
少过（小过）卦第二十八	83	归妹（归妹）卦第二十九	85	解（解）卦第三十	87
丰（丰）卦第三十一	89	恒（恒）卦第三十二	91	川（坤）卦第三十三	92
泰（泰）卦第三十四	95	谦（谦）卦第三十五	98	林（临）卦第三十六	100
师（师）卦第三十七	102	明夷（明夷）卦第三十八	104	復（复）卦第三十九	106
登（升）卦第四十	108	夺（兑）卦第四十一	110	央（央）卦第四十二	112
卒（萃）卦第四十三	114	钦（咸）卦第四十四	116	困（困）卦第四十五	118
勒（革）卦第四十六	121	隋（随）卦第四十七	123	泰过	

1

(大过) 卦第四十八 125 罗 (离) 卦第四十九 127 大有 (大有) 卦第五十 129 晋 (晋) 卦第五十一 131 旅 (旅) 卦第五十二 133 乖 (睽) 卦第五十三 135 未济 (未济) 卦第五十四 138 筮□ (噬嗑) 卦第五十五 140 鼎 (鼎) 卦第五十六 142 箕 (巽) 卦第五十七 144 少藟 (小畜) 卦第五十八 146 观 (观) 卦第五十九 148 渐 (渐) 卦第六十 150 中复 (中孚) 卦第六十一 153 涣 (涣) 卦第六十二 155 家人 (家人) 卦第六十三 157 益 (益) 卦第六十四 159 系辞今译^上_下 162 附：关于以钱代著龟卜筮法答问 181

总 目 录

易经释奥	1
附《系辞》：“尚占答问”	181
钟嵘《诗品》全译注	189
附各家诗选目	289
归有光评传	393
中国古代哲理诗选存目	409
附赏析三例	429
后记	433

对《易》经研究的反思

——写在《易经释奥》前面

(一)

《易》是中国一部最古老、最神秘、最权威，利用率最高而又最灵变的经典。因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究天人之际，通万物之情，总在试图阐明宇宙人生之运动，穷达事物变通的道理，故号之为“天人之学”。单纯从表面看，《易》经最多只不过是一本从初民到历世王者用以卜筮的本本，只因为里边充满了至今人们仍未能全部解释圆满的数字般排列组合的奇怪符号。所以数千年来，注家成林。如果把那些论注推测的有关著作都聚萃在一起，恐怕成立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是决不成问题的。我们民族伟大的文化导师孔子是不是给《易》作过整理或文字上的注释性工作，还不能完全肯定或否定。过去很多学者曾力争《系辞》或整个“十翼”都是孔子所作，那当然是不可靠的。不过不管怎样，他的确曾经以《易》经作过教材，且自己精勤研读到“韦编三绝”。看来他对这部经典用过的工夫，远远超越了对其他古籍学习的时限。子不谈“怪、力、乱、神”，不言天道，也瞧不起“巫医”。但“好古敏求”的习性，使他不能不对任何现象发生兴趣。卜筮最初是不是纯粹一种让人碰碰运气的偶然或叫或然性的把戏，现在还不能说死，但后来却确是牵涉到鬼神的。而神鬼天道的本身，孔子的认识则只承认是人类自我创造的典型而已。“敬如在，敬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不愿以有用的生命去研究无谓的所谓鬼神。他认为人若果能对纷繁杂乱的万象预见到一点消息的轨迹，那便是神。所谓《易》“知几其神乎！”这话虽不一定是他

说的，但也许正是他的“学《易》”的终极自然落到“可以无大过矣”的哲思境界上去的原因之一。而其后孟子的“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的警告，恐怕也正是对孔子“知命不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或恰恰是对“知几”的具体的注脚。如果说《易》能“知几”，也理所当然具有它洞察社会人事或天地自然的渐变到对付其突变的准则。这却又绝不是一般的偶然性所能概括得了的。而这便是孔子或正统的儒家的主要观点。《易》作为经典教材，在中国经典古籍中的位置和作用从秦汉主要论者的序次看，往往并不是相同的。除《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充四教，只说教以《诗》、《书》、《礼》、《乐》，而不提《易》经可作教材之外，其余古籍诸子都以《易》为六艺之一。《庄子·天运篇》引孔子对老聃的话里是：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易》是第五位。

同书《天下篇》进一步概括提出了其作用：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道义。”位置不变。

《礼记·经解篇》又具体一层说：

“温柔敦厚为诗教；疏通知运为书教；恭俭庄敬为礼教；广博易良为乐教；絜静精微为易教；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易》的位置仍是靠后的。

贾谊《新书·六艺篇》开始有排列上的变动：

“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

司马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史记·滑稽列传》：

“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而《太史公自序》则补充说明：

“易著天地阴阳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偏，故长于行；书

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汉书·艺文志·》甚至把《易》推向六艺的最高领袖发源的高度，里边说：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求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

可惜的是《易》的名字究竟始于何时，实际我们现在连这一点也似乎早已不可追考了。郑玄作《易赞》，首先标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并为之解释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这话与《系辞》所谓“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孔颖达却认为“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连、列音近）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亦取岐阳地名，毛诗‘周原既既’是也。”从这一点肯定出发，他又进一步按他的主观想象求证于“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以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但《易》的本初的名字仍未得到解释。且既然连山、归藏都是代号，移以为书名，而并没作为冠首而称之为《连山易》、《归藏易》，又何独文王命之为《周易》而不直接叫它《岐山》或《周》呢？这是很难说通的。然而“三易”的名字又确见于《周礼》，里边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这似乎只透露了一点用法上的消息，就是《易》有三法掌于太卜，即“连山”、“归藏”、“周易”。三者各有自身的系统，内容、方法，而都同为卜筮的本经。杜子春曾提出另一种说法“连山，伏羲；归藏，黄帝。”《玉函山房佚书》辑古

《归藏》，其中坤卦竟有尧降二女为舜妃的话。另外也记到了殷王其国。这些上下矛盾纷扰的现象，真是太多了。汉代桓谭著《新论》又不知何所据而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求八万字的大著于洪荒乃启之世，当然只能一笑置之。且不说“结绳”能不能表达，即令文字发展到了殷商之际就四千三百言，也不知要刻掉多少乌龟壳！且为何一片也没留下？不过若从桓谭接下所说“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这话意分析，似乎桓谭又确信二书一属太卜的范围，一属御史职分所司，并非两书全属一个系统。假令这话是有根据的，那也只能是历史纵向发展抵达某一特定阶段以后的实际，而不是逆测历史过去的理论。因为按理它都应只属太卜所辖，而怎么又移之于御史兰台去的呢？但很值得思考的是，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说过：“钦在恒之前则咸也。”而李过著《西溪易说》也云“临为林祸”。说的是《归藏》的林卦和钦卦。通行本无此二卦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则林与钦明明摆在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和四十四两个位置上，实即临卦与咸卦。我们并不认为帛书《周易》就是《归藏》，因为一是无其它材料可证，二是无从知道朱、李当时的根据。不过可以肯定帛书至少与过去被怀疑究竟存不存在过的《归藏》有较密切的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倘使如此，那么，更足以说明《周易》成书的复杂了。应该肯定地说：《易》本卜筮之书，其成为历史、政治、哲理、修养之学，并以之借天道而泛及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的通塞变化，必在孔子把官学向平民开放以公开授徒并以《易》为正式教材开始以后。《庄子·天运篇》所引孔子与老聃的话，因去古未远，记录应还可以存信，然则其所谓“治易、春秋等六经以为文”，即令真是“述而不作”，而其“举一反三”的启发教程中，必不可能只是消极的照本宣科；只要文献可征，孔子总是对固定的教材有所选择、有所增损、有所修订、有所发挥的。对于简古残缺的《易》，当然更不会例外。不然，凭什么去“以为文”呢？

就《易》经竟能成为如此代代相传，且影响如此之广博深远看，我们可以肯定：假如没有当时的社会心理、即人们的风气习惯、观点、要求、希望和信仰作基础，没有一些权威的老师加以发挥，《易》的内涵乃至说教，绝不会产生它原先所未曾预期的效果，并从而再回过来提炼出更深邃而超远的新的哲学命题，进一步影响其后各个历史社会的有关方面。这种先知者的寻求，当然有时可能呈直线，有时呈曲线，而绝大多数则可能是一团不切实际的乱绪，而且几乎一概不容易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老聃便曾在《老子》中说过：“上士闻道，笃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称道。”《老子》自己便几乎多次被淹没在笑声里。

本来，在任何一种新的学派的观点、思想正式流布之前，乃至流布的全历史过程中，正面的形象，侧面的形象，反面的形象，总是并行的，各领风骚数百年。就如作为道家思想之奠基者老子与作为道教祖师爷的老子；西域求法、白马驮经的玄奘之与降魔伏妖的孙行者、猪八戒的师父唐僧的玄奘，便正是与《易》经的八卦之愈演愈神秘同一遭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易》的最初的诞生是应运的产物；又是在其流布中，随着社会时俗的浮沉，地方风习的影响，而与每一时地的社会意识若即若离中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然后主体开始凝固，而其侧室支子，则自成系统而且愈来愈离其宗，却还在自诩为正宗嫡系。正如《易》的八卦，道家以之为教；军师以之布阵；风水家以之勘舆定穴；武士以之套拳脚；医家以之附脏腑；而《易》之为“义”真是“无不覆也”，“无不载也”了！

（二）

当然，经殷周不少人的努力而成的《易经》除了卜筮的本来面目之外，客观上又的确可以令人从中信服地见到，无论文字表

现的构想、类比、对照、推理、比较的逻辑、方法，既复杂而多采；又粗犷而直率，至于人事的变异、行为、心理的动向，大大小小的祭祀典庆、迁国建侯、战争田猎、畜牧农桑、渔樵仕宦、官场进退、土木营造，以及大自然的迅雷烈风，水利森林，包蒙瓜果，乃至朝政治乱、法制典章、家庭奴隶、妇女地位，公私诉讼、群体冲突，商贾行旅、疾伤生死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几乎空前广泛地给人提供了可以研究的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触及的方面，或从时空范围作了具体表现；或从人事自然因素进行了综观；或从历史传统渊源着手；或从现实类型进行各种现象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照；或从各个独立的典型中见出同异。但实际这不是《易》经的原旨，它只是客观效果上定额以外的产物。没有别的，因为它的本身要求的就是关于人事宇宙人生哑谜的解说，这也就是卜筮的终极。

我们不反对从广义上把《易》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部无所不包的怪书，但也不完全赞成把它说成当时一出现便是一部不带落后色彩的纯资料性的文化现象的汇集。我们认为谁说过的也好，谁反对过的也好，《易》主观上原本不过是以卜筮手册的姿态出现的一部经典而已，只是其作品的客观提供的效果，却确实确实超越了一部古代生民的文化与生存史册的价值。说来也并不奇怪，我们还可以说，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说，所占都极其渺小。然而人的适应、驾驭、创新的力量，却可以托之任何方式以达到无穷时间、无穷空间，产生任何生物所达不到的深远的影响。从事物的发展，或者《易》理的变化观点看，人的思维的进化达到理性和智慧的一定水平上，人对自身的实际存在与客体的关系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懂得了各就各位的平衡效应的力量，因而形成了整个自然群体组织的出现。然而人的理性与智慧因着自身创造的文明与文化而愈益强化的同时，人对自然与群体社会结构的密切关系，却又愈感觉到了其复杂不易顺应。且

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愈感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愈不足则愈忧恐；愈忧恐而愈恶化；于是引起了再度思维的多方面反思和探寻。事实上从宏观出发也好，从微观着眼也好，人的高级思维的触角，总是先于已经存在的形式而获得深化的，虽然它首先必须依赖于已存形式的启示。于是有了预见，有了先知，有了前验，有了推测。这应该是《易》学研究者一个最起码的认识推测。

不要以为《易》的语言仅仅只代表了从原始社会过渡过来时期简陋不全的、因而十分晦涩的情况，是纯时代性或记录工具受限所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代表了《易》的原教旨派那一代一代上层哲人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方法和风格。他们既企望以简朴的形式完成他们主观上神秘世界的刍形，同时又能以先知的姿态直接给人们以指路明灯。于是，从浑沌的意象到符号，不能不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渲染象征的气氛，一种悬浮的乃至游移的外壳，于是形成了一种充满智慧的空灵的寓言或哑谜。于是，在人们的感觉里，乃怕从同一个卦的爻辞中，看到了各种凶与吉，利与不利交叉统一的复杂矛盾现象。既充满了可喜的召应与呼唤，又出现警告的回响；既嚶嚶如啼泣又朗朗如欢笑；既沉沉如幽暗的深夜，又彤彤如彩霞满天的黎明；既呈现着残酷的五刑，又陈列着仁慈的酬赏；让人的心灵和感官既得到痛苦中的麻醉，又得到喜乐中的清醒。总之，一切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然后经过自我破坏，去寻求新的轨迹。所以说：“卦者挂也。悬挂物象以示吉凶也。”不过这些一登孔子的杏坛或官校的讲席，色彩便变得更加庄严神圣了。在科学尚未倡明的历史时期，无论希腊的哲人，印度的婆罗门、犹太的祭司、基督教的先知，一切东西方古代的预言家，没有不在他们当时的社会群体和政治经济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中国，三代的巫祝，更成了与史官一样作为国家权力的两大象征和支柱。而《易》经则正是他们的“《古兰经》”或“《新旧约》”。这些人，运用里边这

八个简单而充满了魔术变化性能的代数里的X式的卦象，企望从心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全方位的高度去严格把握人们本身与客体之间种种变化的结构因子；枢转其序列的运动与机制，按照人们的需要、目的、功能以及活动的方向、范围与手段，让崇奉膜拜者获得精神上暂时的缓解，并让其事业和欲求得到希望与力量，从而充满了信心。“知几其神乎！”真是这样吗？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间，信息互相不能迅速传递，不能密切准确交换的古代，其实这只是一幻想出来的美丽的彩虹，只是人为地涂抹在偶像上的耀眼的光环。历史证明，现实的行程，就从没有按照他们先验的论断进行过。但却又正是因为这样，这些追寻预定目标的魔术符号，产生了更多的子目来，给人以更多的海市蜃楼的幻影。考其初意，无非企图把握现实蕃衍杂出而生生不息的变化的端倪，让现实去作印证。可惜的是这种凭空的幻想，其范畴再大也填补不了他们原始意图的空白。这便是八卦衍进重迭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析为三百八十六爻而仍然未能真正做到“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

如果《系辞》是汉代经过修整晚出而假名于前朝的赝品，那么《系辞》的作者曾经泄露过这么一个消息，在那一相当长的阶段以来，学者对于《易》经本身的运用，实际就是各按所需在行事的：“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实际这并不就等于八卦在应用中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序列也绝非因其轻重主次而进行先后排列的。有的学者从形式上认为把占放在第四位说明占并不是主要的。其实古人论事，并没有那么机械。孔子行四教，岂是因为“文”在第一位而“行”与“忠”“信”三事推到了后位？这毋宁说、前三者恰恰都在为卜筮作相辅相成的服务而已。我们只相信八卦的符号是最原始的现象，重卦的出现，则是《易》理第一次最了不起的智慧的演进。究竟是谁第一个开始重卦，过去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王弼等认定是

伏羲画卦，又自重之。郑玄把创作权归之神农。孙盛移后于夏禹。雍重、司马迁说其实创自文王，但又苦于都拿不出半点证据。无厘论厘，盲目争论了千年。我们现在看到，六十四卦之与卦辞、爻辞几乎是顷刻不可分割的一体。假若没有卦辞与爻辞作为说明同时出现，则六十四卦只是一组形式上的空洞符号，除了显示一番密码的神秘性之外，它能说明什么问题起到什么作用呢？而六十四卦的衍生，头脑里先没有程度上的进化发展的现实提供象征的类型，又不可能那么完备。古近学者早已剖析这一说法的渊源，认为这四者具体说来都应在六爻既定之后：三画之时，象繇未出，用什么去“尚其辞？”因三画的基础才有重卦，有重卦然后有变动。如果三画不动，怎么去谈“尚其变”？揲蓍布爻，才有卜筮，蓍筮完全是应六爻而来，光只三画，用什么去“尚其占”？制器固传开始于伏羲，但完备规模则是以后无穷时空的问题了，也就绝不可能滥觞于简单的三画，以“尚其象”了。这也就是说，所谓《易》的“圣人之道四”，都只能是后世演绎到一定阶段以后的总结。本来，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大抵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直觉而陷于神秘或者绝对主义的极端，则结果往往是作茧自缚，桎梏了自己的出手，要求其立稳足跟尚且不易，更何由谈到创新与发展？同理，思维而陷于不加分析，则最后常常是自相矛盾，混乱而无法自圆其说，也就谈不上自身生命的延续了。而《易》经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灵活而严密，比如其道理上的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物极必反，相反相成，阴阳交感、阴阳相斥等等的观点，作为生存下来的依据，则正是中国古代先哲们思维方式所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雏形。所以更让作为哲学的《易》充满了迷人的色彩。卜筮之术而能如此，这是叫人难于想象的奇迹。

（三）

中国古代生民之初，对鬼神究竟是怎样一种看法，不可以完

全得知。但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古人自我限制的方法看，有时也是十分可怜的。举凡心有所疑，猜测难定，或生活中偶然出现了一点异于寻常的小事，便认定这是祖先和神的启示。应运而生的便是占象之官，便是巫覡的出现。故天地风雷烈变必占，久雨久旱必占，地震山崩必占，而禽兽鱼虫则是象占的工具。象占之外，当然更多的是龟蓍为对象的卜筮。《诗经·定之方中》注说“美卫文公也。”卫为狄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穰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如果这真是历史的真实，那么原诗所谓“卜云其吉，终然允臧的预言便真是太有意思了，即令只算是一次偶然。又《诗·绵》里说的“爰始爰谋，爰及我龟”，难道不也正好是同一性质、同一形式的记录？据说古时的“筮人掌九筮”，其一则“筮更”，所谓“更”即变换，所以注说“更，筮迁都也”。综观一部《尚书》二十卷五十多篇诰文中，谈及蓍龟卜筮的，从篇数的比例看，竟占四分之一：像《大禹谟》、《禹贡》、《盘庚》（上、下）《西伯戡黎》、《洪范》、《召诰》、《洛诰》、特别是写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的第二十四章《顾命》里，把“河图八卦”和国家重宝一道移交下传的严肃状态更是十分富有戏剧性的生动描摹。而《金縢》里还两番提到。《大诰》则更提到三次之多。所以与其说卜筮之官胜过任何重臣，毋宁说八卦似乎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命在人间的象征了。难怪后人要说“殷人尚鬼，周人重卜”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要推求卜《易》的起源，必不可能在文字出现之后或至传说的结绳之世。这可以从易的几十处“利涉大川”、“利远行”看出原始初民到处流浪，远远没有定居生活的消息，因为他们随时有为洪水猛兽所伤害的缘故，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古人用卦，其初可能是十分简单的。但随着思维的复杂化逐渐产生了定型的内在原则，譬如先用蓍草求得每爻的数据，这名之曰筮，再用龟进行火灼，根据拆裂的条数和走向，名之曰卜，